

[美] 鲍威尔 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跃 译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美] 鲍威尔 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跃 译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 (美) 鲍威尔(Powell, J. B.) 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跃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458-0256-6

I. ①我… II. ①鲍… ②邢… ③薛… III. ①鲍威尔, J. B. —回忆录 IV. ①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8494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丁 多
封面设计 张 懿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美] 鲍威尔 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跃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0 千

2010 年 8 月第一版 201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256-6/K·43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开始与中国结缘

1. 东方之行 1
2. 密勒和《密勒氏评论报》 7
3. 1917年的上海滩 17
4. 孙中山和袁世凯 26
5. 内战的阴影 32
6. 蓝辛—石井“事件” 38
7. 流亡上海的白俄 46
8. 编辑做说客 54
9. 山东与华盛顿 63

第二部分 扑朔迷离的 20 年代

10. 前清秀才、基督将军、东北虎 75
11. 临城劫车亲历记 82
12. 华南的事务 112
13. 20年代的党派斗争 118
14. “四一二”政变中的内幕故事 125

-
15. 干涉的外交伎俩 140
16. 采访“中苏之战” 148

第三部分 “九一八”枪声响起之后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爆发 160
18. 苏联、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微妙关系 170
19. 海参崴之行 179
20. 横越西伯利亚 191
21. 1935年的莫斯科 203
22. 取道日本回上海 214
23. 1936年的菲律宾 222

第四部分 从“西安事变”到南京的陷落

24. 西安事变 231
25. 端纳的斡旋 244
26. 西安事变的结局 250
27. 日趋紧张的局势 264
28. 1937年的美国军舰和日本炸弹 276

第五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29. 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292
30. 越来越重的压迫 297
31. 炸弹与刺刀 306
32. 纳粹德国的魔影 313
33. 历史断线了 324
34. 日本人的“效率” 332

第六部分 战俘生涯及迈向新生之路

35. 恐怖的大桥监狱 338
36. “危险思想” 351

37. 美国援华谷物	359
38. 交换名单	365
39. 踏上归国航程	369
40. 中国之未来	379
后 记	384

第一部分 开始与中国结缘

1. 东方之行

1917年2月初的一天，我搭乘的一艘小货船，缓缓地靠上了上海虹口码头。船一停稳，我拎着自己的手提箱登上了岸，雇佣的一个苦力，扛着我那只洋铁皮衣物箱跟在后面。天正下着雨，黄浦江边的街道显得非常狭窄。街道两旁，是连片的船用货栈和仓库，路面被雨浇得泥泞不堪，寸步难行。两辆黄包车从后面紧跟上来，招呼我上车。这种靠人力拉的车，足以容纳一个乘客和行李，但是，我仍决定步行去我要去的旅馆——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 Hotel）^[1]。我这次东来，曾在日本稍事停留，第一次看见了黄包车，而且还在横滨坐过，但此时此刻，我仍对东方的一切感到陌生，不忍心坐在由人类拉着跑的车上。

我这次东方之行，是受美国密苏里大学一位毕业生，在远东

[1] 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 Hotel），即今上海外白渡桥北堍的浦江饭店。始建于1860年，为上海开埠后第一代新式旅馆。

地区负有盛名的记者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密勒^[1]电邀，到上海帮助他创办报纸。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要在这地球上政局最动荡的地区呆上25年，来从事报业生涯。

密勒的电报，是从上海打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W. 威廉的，说他希望聘用一名新闻学院毕业生，协助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纸。威廉院长把电报给了我，而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封越洋电报。

这段时间里，我正在为其他两个工作机会犹豫不决，定不下心来。这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衣阿华州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家经贸杂志邀我作发行人，另一个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报社发行人，聘我作他的助理。可是，到东方去的念头着实具有诱惑力，在我与妻子和同事们认真商量之后，我推掉了以上两个差使，并着手结束大学里的工作。

我不是厄普顿·辛克莱^[2]小说中的那位英雄，“降生在国际社会和外交阴谋的王国之中”。我出生在密苏里州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就读于当地的乡村学堂，随后在那儿教书。后来靠着帮人发送报纸，一份日报，一份晚报，赚了一点钱，才去伊利诺斯州昆西城，读完高中和商学院。这样过了几年，我进入资深的《昆西自由报》(Quincy Whig)作实习记者，以便为我去密苏里大学读书赚学费。在密大，我就读的是该校新成立的新闻学院。四

[1] 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密勒(Thomas Frank Lin Fairfax Millard, 1868~1942)，美国报人，1911年在上海创办《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任主笔，立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17年创办《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后被北洋政府聘为对外宣传顾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密氏仍充顾问。

[2]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美国作家，其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黑暗，代表作有《屠场》等。

年后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汉尼巴尔《信使报》(Courier-Post)工作。

这里是马克·吐温^[1]的童年居住地，闻名遐迩。我在《信使报》里先后做过发行部经理、广告部经理和报纸市政专栏编辑。四年后，我重回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讲师。

那时，我同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对遥远而陌生的东方的全部知识，只是从学校的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中获得，不过几页文字而已，而且地图绘制得错误百出。即使在大学课堂里，我也记得仅在一两次课程中，教授讲到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中国史，并且语多不恭。

在密大新闻学院，我认识了几位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黄兴(译音)，他出生于广东，并在檀香山呆过。他跟我共同筹办了“天下俱乐部”，成员包括许多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另一个是我教过的学生董显光^[2]，他来自上海。黄和董后来均成为中国新闻界的著名人士，但两人的政治立场相去甚远。还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名字叫户田，虽然身材矮小，但在学生义勇军中表现出色。他来美国读书之前，已经在日本军队中当了三年大兵。

我即将去上海帮助办报这件事，激起了许多同学的巨大好奇

[1]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美国作家，著名的长篇小说有《镀金时代》《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作品思想深刻，文笔清新生动，以幽默讽刺见长。

[2] 董显光(1887~1971)，浙江宁波人。1909年留学美国，攻读新闻及法律。1913年回国后，历任《中国共和报》副主编、《北京日报》主笔、《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及参议院英文秘书、交通部参事。1929年，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旋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曾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去台湾。

心，甚至不無羨慕。實際上，我自己對那張報紙的情況，卻一無所知。同時，人們向我提出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弄得我心煩意亂，根本無法靜下心來。一個朋友跑來問我，能否閱讀“雞爪印”似的中國字？說着，遞上一張當地中國洗衣坊開的發票，要我念給他聽；新聞學院的理髮師，則問我是否要留一個“辮子式”髮型。

隨着到中國去的日期愈來愈近，我對於未來的辦報工作也逐漸有所了解。我以前曾寫過一篇關於小報的組織綱要，在一家報紙刊出後，受到小報館的普遍採用。可是，這種文章對我的新工作有否用處？上海要辦的報紙屬於哪種類型？我要不要寫社論，拉廣告，推銷報紙？或像通常的小報一樣，每樣事情都得自己干？就像我先前在《信使報》工作時，除了排字，幾乎樣樣都做。另外，我不知道中國是否有印刷工人工會，中國報紙是否採用能鑄造5000個漢字的新型鑄造活字機？有人告訴我，這是一期中國報紙的常用字數量。

為了獲取尽可能多有關中國的知識，我翻遍大學圖書館，总算找到了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另一本是《中國農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作者是美國傳教士明恩溥（Dr. Arthur H. Smith）^[1]，他在華傳教50多年。他以言辭幽默著稱，這在他的書中也隨處可見。但在美國的中国留學生，並不喜歡他寫的書，認為他對中國人生活的描述過於獵奇，不切實際。我剛到上海時，曾聽過明恩溥博士就北京政治狀況發表的演講，當時北京政府剛剛經歷了一場危機，即反動勢力陰謀復辟清王朝。演說後，明恩溥博士就動身回

[1] 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美國公理會教士，1872年來華傳教，兼任上海《字林西報》通訊員。著有各種有關中國的著作。

美国安度晚年。在他的这次演讲中，他结束时说道：“中国正站在悬崖边上”，令在场的每个人，特别是新来的外国人心情沉重，久久不愿离去。这时，明恩溥博士风趣地眨眨眼睛，然后紧接着说：“事实上，从我 50 多年前来中国时起，这个国家一直站在悬崖边上。”真是妙语连珠，大家的沉重心情，不禁为之释然。

1917 年 1 月，我乘坐一艘日本远洋客轮“日本丸”，从旧金山出发前往中国。当时，我认为美国不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已经历时三年了。客轮停靠日本长崎，即到达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站时，情况仿佛有些不妙。长崎是最早与外国人交往的城市，历史悠久，我们上岸游览，逛街购物，忽然一位船员匆匆赶来，说船长奉上级之命，所有欲往上海的乘客，都须回到船上取下他们的行李，留在长崎自谋出路，客轮将改驶马尼拉。我和另外两三位同船的乘客，虽然是买了前往上海的票子，但这时突然发现身不由己，孤立无援，被人扔在长崎这个陌生的港口城市里。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去长崎轮船公司打听，看看有没有其他客轮前往上海。但轮船公司说，在三个星期内，不会有客轮驶往上海。由于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我只好去碰碰货轮的运气。港口内正好有几艘货船在作业。于是雇了一条舢舨，在港口内到处转悠，总算找到一位船长，肯带我去上海。他给我一个舱位，条件是把我的那张越洋船票给他，另付 10 美元，途中膳费自理。

几小时后货轮就要起锚，因此我匆匆取来行李，顺便买了一些途中的食物。船长只能说一点蹩脚英语，而且对美国人也毫无兴趣。

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刺骨，没有一丝阳光。但当船穿过九州西边海岬时，太阳冒了出来，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这时，我开

始聞到船上有一股呛人的臭味，而且隨着天氣變暖，這股臭味愈發厲害，令人作嘔。我跑去問船長，為什麼船上竟有這種臭味？他指了指甲板上和船艙里的貨——全部用稻草捆綁着，看不清是什麼——然後說：“臭腌魚，只有中國人才吃的臭腌魚！”幾個星期後，我的衣服上仍有這股臭味，而在我的腦海中，似乎幾年之後才算抹掉了它。

雖然如此，我能登上這艘船實屬幸運。另一艘在俄國海參崴註冊的“波特娃”號，一星期後自長崎載客開出，在中國海遇上台風，被刮到近上海南面的海岸邊，經過艱苦的救援，才使船上的乘客脫險。

在我從舊金山踏上東去之路時，我還不知道那時經營橫渡太平洋航線的客貨輪，都是在日本註冊的。後來經營太平洋航運極具影響的多拉爾（Robert Dollar）船長，曾被迫將他的貨船改到加拿大註冊，而美國唯一的客運公司——太平洋郵船公司，只好收縮到南美和巴拿馬運河航線。在美國即將投入大戰的緊急關頭，仍迫使美國撤回不甚發達的太平洋航運的原因，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拉福萊特法案》（La Follette Act），它由威斯康星州自由派參議員拉福萊特^[1]提出，旨在幫助美國海員。在這項法案中，有一款明確規定美國船主不得僱用東方海員。由於美國船隻付給美國海員較高的報酬，而英、日船主僱用大量低薪的東方海員，因此，兩者之間競爭的結果不言自明，美國無法繼續經營太平洋航線，出路只有兩條，要么從這一航線撤出，要么改在英國註冊，因為英國允許僱用中國水手。實際上，同其他任何國家的好

[1] 拉福萊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 1855~1925），美國國會眾議員、參議員，曾三度當選為威斯康星州州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水手一样，中国水手工作效率高，为人可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在英国注册的船只撤到了大西洋，结果是让日本人独揽了太平洋航运。直到战后，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以与商人签订奇怪的运送邮件协议的形式，由政府出资建造船只，美国商船才重回太平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可以说除了几艘军舰外，没有任何其他美国船只。

2. 密勒和《密勒氏评论报》

礼查饭店是当年上海第一流的旅馆，其前身是早年来华的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一座供膳公寓，——他把自己的船留在了上海，其名字也来源于美国最著名的纽约礼查饭店。但是，这位船长不得不在名称上加添“旅馆”这个字眼，因为纽约礼查饭店的大名，还没有传到中国。除了名称以外，这两家饭店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上海礼查饭店四面临街，由两幢三层和四层高的楼房组成，有长长的通道串连着。饭店的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厅院，晚上交响乐队常常在此演奏。晚上8点起，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下来进餐，这时，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上海曾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坐在饭店的大厅里，张开眼睛随便看看，那么，你几乎可以看到混迹于这个城市的所有骗子！”

我寻到礼查饭店后，打听下榻在此的密勒先生住几号房；一位仆役轻声地说，他就住在饭店里，并且马上就会来大厅坐坐，我刚想问他长得如何模样，那仆役就叫我看一位正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只见那人身材单薄，体重125磅左右，但穿着异常考究，我不由突发奇想，他怎么能够在坐下来时，不弄皱他那套笔挺的西服呢！

我的老板密勒先生曾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工作数年,先写戏剧评论,后做国际政治记者,继承了已故的《纽约先驱报》主持人贝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许多怪癖。

自然,我急切地想知道,有关上海报纸的许许多多问题,但密勒似乎不急于告诉我;何况我们也无暇谈及,因为我们马上被正在吃午茶的许多英美人围住闲聊。所谓的“茶”,实际上是指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

这种不受拘束的饮酒,不由使我心中痒痒的,因为我生长在美国中西部自动禁酒的土地上,而且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正接近于1920年开始的持续几年的“大实验”(“great experiment”)^[1]。围谈的人愈来愈多,仆役又搬来一张大桌子,好放置更多的酒瓶和杯子,当新进来的人过来寒暄时,他们总是要求同已在场的再干一杯,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喝了一杯又一杯。仆役在每次上酒后,都把一张帐单递给要求干杯的人,付款的主人,则从来不瞧那帐单上的金额数目,一签了事。

在我坐等密勒先生的时候,看了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上面刊载了路透社的一则重要电讯,说美国已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1917年2月3日。但在我们的谈话桌上,却没有一个人说起美国参战之事,相反,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酒”字上,说美国可能采取酒类禁运措施,以及由于英国航运业衰落,限制了酒类运输,导致酒价不断上涨等等。但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上海总是有酒喝的,至少在酒这个问题上,英国人要比美国人明智得多。

这时,一位头发灰白、中等身材的人进入大厅,大家的交谈戛

[1] 大实验(“great experiment”),指当时在美国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禁止在全美制造、运输和出售酒精饮料。凡是含酒精量超过0.5%的饮料,如啤酒和葡萄酒,都在禁止之列。

然而止。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美国驻沪总领事托马斯·萨蒙斯(Thomas Sammons)。他是一位可爱的官员,只是经常担心在上海会发生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会使他卷入与美国国务院的冲突中去。

后来美国的参战,果然大大增添了这位总领事的责任和焦虑,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性质特殊。中国尚保持中立,德国、奥地利的领事和侨民,并没有受到限制,照常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所有的英国人和大部分的美人,却不再跟他们交往或做生意。

人群散去后,密勒先生建议我就在礼查饭店开个房间,并介绍我认识了饭店经理莫顿船长(Captain Harry Morton)。因为礼查饭店的各位经理,大部分做过船长,所以这家饭店的许多方面,都仿照着船上的式样,如饭店的走廊,油漆得颇似客轮上通向睡舱的通道。莫顿船长说,他会在“统舱”里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每月房租125元,包括膳食和午茶,折合美金约60元。

第二天,在密勒先生的套房里,我才有机会与他讨论即将着手的工作,同时,还了解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

1900年,密勒先生作为《纽约先驱报》驻外记者,来华采访报道义和团事件。在那时和后来的采访活动中,他结识了不少中国政治领袖,如袁世凯、唐绍仪^[1]、伍廷芳^[2],上海第一家

[1] 唐绍仪(1861~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早年赴美留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首任内阁总理。旋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财政部长。1931年任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欲利用其出面组织伪政府,1938年9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死。

[2] 伍廷芳(1842~1922),广东新会人。曾赴英国留学,毕业后获大律师资格。1907~1909年,任清政府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袁世凯夺取民国政权后,退居上海。1917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

近代化银行的创办者 Tong, F. C. (待查),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中国在那时还是帝国, 但有大量的迹象表明, 一场革命正在酝酿。1911年, 密勒先生在中国创办了第一家美国报纸, 即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China Press)^[1]。在办报过程中, 后来成为东京《日本广告人报》发行人的 B. W. 弗莱塞 (B. W. Fleisher), 曾做过密勒的助手; 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制造商查尔斯 R. 柯兰 (Charles R. Crane), 为《大陆报》购置了字模和机器设备, 成为该报的大股东和社长。柯兰有意在外交界发展, 1909年被美国塔夫脱总统指派为驻华公使, 但未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才重新接受了这项任命。

上海的一些著名中国人士, 包括唐绍仪和一些银行家, 当初都许诺承购密勒先生新办报纸的股份。但当印刷机抵达上海时, 不少人中途变卦, 不肯入股, 密勒先生经过一番明查暗访, 发现是老牌的英国《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2] 捣的鬼。《字林西报》简称 N. C. D. N., 是除香港以外英国的海外第一大报, 主持者当然不希望有美国报纸与之一争短长, 特别是像《大陆报》这样类型的, 拥有一些中国股东, 鼓吹中美合作。上海的美国人为数不多, 却在不断增加, 大家普遍感到应该有一份美国报纸问世。

《字林西报》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 反对创办一份美国报纸。

[1] 《大陆报》(China Press), 由美国报人密勒及弗莱塞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1911年8月正式发行。30年代后改由中美合办, 以促进国际合作, 赞助中国国民政府的建设工作, 造成更理想的上海国际社会和商业进步为宗旨。

[2] 《字林西报》(N. C. D. N.) 1864年, 英侨在上海创办的大型英文日报。后在远东地区负有盛名。辟有本埠消息、中国内地消息、国际消息、经济新闻、船舶消息、体育游戏新闻、时人行踪等栏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1945年复刊, 1951年终刊。

《大陆报》曾因经营得法，并辟有连环漫画和其他吸引读者的专栏，很快在销量上超越《字林西报》，但仅有发行收入，仍不敷维持报纸的生存，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最后，密勒不得已辞去《大陆报》总编一职，报纸的主要股份，卖给了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和保险业的一家美国公司，但这家美国公司又将股份卖给了一家英国公司，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这就是办报的过程。但是，我来上海帮助密勒先生，要办的是一份新报纸，一份周报，密勒已定名为《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他已买了一些字模和白报纸，其他事情一概留待我去做。可以说，创设一份新的美国报纸的责任，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我们在印刷厂附近租了几间房子，作为报社的办公室，随即投入工作。我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我们是自己印刷还是委托印刷厂代印？”“报纸会有多大的销量份数？”“我们从哪里去拉广告？”“中国人会看我们的报纸吗？”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报纸究竟应该登载什么内容？”不想，竟立刻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正直挺挺地躺在椅子上的密勒先生怒冲冲叫道：“他妈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

当我挨家挨户在中国商人与外国人中宣传这份报纸，并向这些潜在的订户和广告客户宣布这个编辑方针时，我总是得到他们会心的大笑。后来我知道，正是密勒先生“他妈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这句话，才起了如此作用，也正是为了这句话，他才不惜辞掉《大陆报》总编的职务。对于这一基本原则，他后来从未退缩过，而他的许多同事，为了尽快获取利润，往往随风转舵。

接下来就是忙碌的日子。办公室租好后，又与一家属于法国耶稣会的老式印刷厂签订协议，代印我们的报纸。这家印刷厂收